

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倾斜的分数线—— 中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地区差异

王恩儒 陈金永

主 编 蔡 昉
副主编 张展新

在许多国家,教育对个人及地区的生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现代社会普遍认为基本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同时,教育被普遍认为是社会地位流动的一个主要渠道,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讲尤其如此。因而,大学录取时对弱势或少数群体(少数族群或低收入阶层)予以适当照顾这一做法非常普遍。过去几年中在美国,即使这样的照顾政策也遇到了挑战,例如最近加州和华盛顿州的公立大学取消了对少数族裔的照顾^①。

在中国,进入大学学习当然是一件大事。一方面因为入学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大学教育对于将来获得好的工作和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父母对独生子女寄予更大的期望,使得竞争更加激烈。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讲,孩子进入大学不但为他自己获得了光明前途,还可为全家带来利益与荣耀。教育对社会地位流动的重要性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古语如“学而优则仕”以及古代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

即使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中国,尽管过去几年大学大幅度扩招,入学的竞争,特别是进入名牌大学,仍然十分激烈。进入大学的主要“战场”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俗(简)称“高考”。考生考前即考试期间付出的超凡努力表明了高考的重要性。没有人有精

^① Lydia Chavez (1998), *The Color Bind: California's Battle to End Affirmative A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usan Wierzbicki and Charles Hirschman (2001), "The End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Its Impac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Research Report for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5

确的统计,但每年全国围绕高考已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辅导书籍材料,培训班,辅导老师,甚至营养滋补品等等)。

高考结束分数出来后,下一步是大学录取。根据他们的分数,考生被录取到不同的大学和专业。除极少数有特殊才能或一些特殊群体(像少数民族)的考生能得到少量照顾外,决定录取的分数完全来自考试。分数线非常严格,一两分之差就可以决定能不能升入大学。这种严格地基于分数的挑选看起来优点是保持公平性,不受人为因素及不正之风影响。许多海外人士甚至国内的考生都相信这种录取制度的公正性。但近两年,它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讨论高考和大学录取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数线,侧重于分析它的地域差异。以前,由于高考的资料信息缺乏,学者们很少关注这一课题。过去几年,信息资料特别是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使得我们能够找到以前没有的数据并作一些实证分析。下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高考制度和大学录取的背景;随后的几个部分里我们分别解释我们的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发现,并尝试探讨大学录取中地域性差异产生的因素。文章的最后部分里,我们在更宽的背景下讨论一些启示。由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完全,本文的分析属于探讨性的,个别地方可能只属于推测。我们希望通过提出问题,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探讨我们的分析和看法。

高考与大学录取制度

在中国,高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参加高考。高等教育项目包括本科、专科和研究生教育。相应地,高考计划招生中主要有四个层次的分数线:最低分数线(中专),专科分数线,一般本科分数线,和重点本科分数线。一般来讲,被录取到什么层次的学校和教育科目完全取决于在高考中的成绩。譬如,达到最低分数线但没有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会被录取到中专学校(严格来讲,中专并不属于高等教育)。然而,一部分考生在录取过程中会得到一些照顾。每年高考前,教育部门都会颁布可以享受照顾的几类考生的详细列表,包括有特殊技能的家庭(学习、运动等),对社会有特殊道德、精神贡献的,特殊社会群体的家庭

的考生(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归侨及来自港、澳、台的考生)等等。

大学录取中的照顾措施在西方国家也不鲜见。在美国,许多大学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些学生更容易进入高等教育。同样,在许多国家,出色的运动员很容易被大学录取。因此,某些照顾的做法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在文章的后面部分中表明的),在中国,“照顾”有时是基于行政/地域单元。比如,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般及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最低录取分数线(中专或专科)在每个市甚至县都不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多个地域或行政级别的不同地区的变化,并分析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除了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照顾政策以外,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照顾条例。本文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分析这些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动机。通过这些分析,本文希望揭示在全国统一招生制度下分数线和照顾政策背后可能掩盖着的差异和不平等。在阐释这些差异的时候,我们把高考放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转折的宏观环境中,并分析高考与国家的其它制度(如户籍制度)的联系。我们无意借助本文强调我们自己的对“公平”的价值判断。我们只是通过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平衡这一议题来侧重于表达和解释造成不平衡的可能因素以及提出一些政策启示,并表达我们对中国目前试图同时建立一个新的高效的高等教育体系,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保障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的关注。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往往感觉到资料的缺乏是研究中国教育问题^①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过去由于关于考生及招生人数的详细数据很少,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的研究很难进行。比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高等教育的一些指标如在校人数、每年招生人数等

^① Xue Lan Rong and Tianjian Shi (2001), "Inequality in Chinese Edu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26 pp. 107-124.

大概括因而对研究高等教育机会不平衡用处不大。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商业网站建立起来,包括一些主要传统媒体和大多数政府部门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由于对人们(考生和他们的家庭)的重要性,高考成为新闻焦点之一,特别是每年高考举行前后。大概从1999年起,每年很多信息,包括国家和各省份的招生人数,各地录取分数线,以及一些大学的招生情况,出现在互联网上。由于有很高的时效性,这种信息来源不但为父母、老师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引导孩子或学生准备高考,还为学者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渠道。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主要依赖三种资料来源:互联网媒体,传统报纸和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从互联网媒体和印刷的报纸可以了解到各地区的分数线,全国及各大学的招生计划,而用政府统计部门出版的社会经济资料则可以展开一些譬如对经济发展水平和获得教育机会之间关系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高等学校大幅度扩招^①,对高中毕业生来说进入高等教育看起来比以前容易得多。但由于相对快速增加的考生人数而言,重点大学的招生人数仍然非常之少,进入好的专业特别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全国范围内不同省份的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和山东省不同地市一般本科的录取分数线,来展示高等教育获得机会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在大部分地方有理工科和文科两类考生。一个地方两类考生使用不同的考卷并有不同的录取分数线。由于理工科考生远超过文科考生人数^②,限于篇幅我们只分析理工科考生的分数线。

除了参考已有的文献和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本研究的一个显著

① 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机构(不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及成人学校)为108万人。1999年和2000年,这个数字分别攀升到160万和230万。两年期平均每年扩招45%,2001年招生人数继续增加到250万(新华网, <http://www.xinhua.org>, 2001/02/23)。

② 1995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总人数为253万人,其中大约65%报考理工科,35%报考文科。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全国的更新的数字,北京和上海的文科报考比例多少代表了其他地区和全国的情况。

特点和重要方法是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源。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去获得以前通过传统渠道不能及时获得的信息资料。除了利用网络上获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数字(像分数线和招生人数)外,我们还会引用一些新闻报道和民意调查来支持我们的论述。为了尽量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只关注大的、有影响的门户网站和主要媒体的网站,并在引用数据和报道之前作一些比较和论证。

中国高校录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国性的大学(大部分是重点大学)都有分配到省的计划招生名额。这种计划过程背后的依据和原则没有真正公开过,但招生名额的分配看起来并不完全根据各个省份人口的多少。在得出我们自己的论断之前,我们通过写信给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和教育部的有关官员,询问他们有关制定招生名额计划的依据和机制。尽管只有两所学校认真地给予我们答复,我们仍然得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资料。另外,除了我们自己的高考经验和观察,我们还面谈了不少来自国内许多地方的有高考经历或在高校执教的人们,他们也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和独到的见解。

实证发现——倾斜的分数线

在“全国统一考试”的旗帜下,人们很容易对高考产生一种“平衡”和“公平”的印象。即使由于政府部门制定一些政策而使录取分数线有所变化,多数人会期望来自弱勢群体的考生(像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等)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但绝大多数考生应在统一标准下竞争。过去人们很少关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地区性差异。在评估录取的过程和结果时地理位置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高考录取中的地区不平衡事实上早已存在^①,虽然只是最近几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发现录取分数线变化呈现一种有规律的地理格局。我们将在不

① 例如,Pepper (1984)发现,在1980年,对重点和一般大学而言,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参见 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Research Report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pp130, Table 7.

同的地域层次上展示这种变化的格局。除了地域方面,和人们的想法当然相反,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某些照顾政策有可能只惠及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好的考生和家庭。

各省份重点大学的分数线

尽管是全国统一考试,不同省份的考生可能以不同的分数线被录取到重点本科院校。2000年,北京市理科考生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76(满分750),河北省的考生要599分以上才能进入重点大学——差距达83分之多!换句话说,北京市的考生如果考476分就有可能上一所名牌大学,河北省的考生考476分根本进不了任何正式的高等教育院校^②。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99和2000年重点和一般本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大多数省份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所有的省份可以划分为四个组。第一组包括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尽管在所有的省份中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显著低于其他许多省份。第二组(大致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和黑龙江)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的第二梯队,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在四个组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第三组包括一些经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省份,但这些省份的分数线却高于其他三组的大部分省份。特别是湖北,河北和广西,在所观察的两年(1999和2000)录取分数线最高,虽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前两组的大部分省份。第四组的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第三组的省份。由于少数民族大量聚居于这些省份,国家在高考录取中对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考生有一定照顾,这个组内大部分省份的分数线远低于第三组。

表1 按省份理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1999)和经济发展指标(1998)

省份	满分	重点大学分数线	占满分的比重(%)	一般本科分数线	人均GDP* (元)	城市人均收入(元)	农村人均收入(元)
北京	750	460	61.33	421	16142	8472	3952
天津	750	488	65.07	434	13964	7111	3396
河北	750	546	72.80	504	6479	5085	2405
山西	750	535	71.33	496	5048	4099	1859
内蒙古(汉族)	750	496	66.40	469	5084	4353	1981
少数民族		448	59.73	419			
辽宁	750	525	70.00	465	9338	4617	2580
吉林	750	525	70.00	475	5892	4207	2384
黑龙江	750	520	69.33	470	7508	4269	2253
上海	750	485	64.67	441	25193	8773	5407
江苏	750	546	72.80	501	10025	6018	3377
浙江	750	540	72.00	494	11193	7837	3815
安徽	750	517	68.93	499	4537	4770	1863
福建	900	617	68.56	547	10095	6486	2946
江西	750	542	72.27	525	4419	4251	2048
山东	900	599	66.56	575	8104	5380	2453
河南	900	633	70.33	575	4677	4219	1864
湖北	750	566	75.47	535	6271	4826	2172
湖南	750	537	71.60	495	4939	5434	2065
广东	900	620	68.89	600	11087	8840	3527
广西	900	656	72.89	589	4071	5412	1972
海南	900	601	66.78	540	5829	4853	2018
四川	750	511	68.13	459	4671	5467	1720
重庆	750	508	67.73	448	4216	5127	1789
贵州	750	480	64.00	404	2301	4565	1334
云南	750	440	58.67	375	4329	6043	1387
西藏(汉族)	750			345	3618		1232
少数民族				315			
陕西	900	596	66.22	538	3842	4220	1406
甘肃	750	487	64.93	453	3453	4010	1393
青海(汉族)	750	420	56.00	383	3453	4240	1425
少数民族				46.67			
宁夏	750			4377	4377	4112	1721
新疆(汉族)	750	470	62.67	420	6392	5001	1600
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		404	53.90	353			
少数民族(普通话)		315	42.00	283			

*说明:由于根据统计数字计算人均GDP时没有把流动人口考虑进去,因此这里的人均GDP的数值并不准确。人口流入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可能被夸大了。但在本文里,它大致可作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

① 这里,所谓“正式的高等院校”指公立高等院校(不包括私立或民办大学)。截至到2000年8月,中国有1018所这样的院校。具体名单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

② 2000年河北省理科考生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80分。

表 2 按省份理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2000)和经济发展指标(1999)

省份	满分	重点大学 分数线	占满分的 比重(%)	一般本科人均 分数线	GDP·城市人均 收入(元)	农村人均 收入(元)
北京	750	476	63.47	440	17299	9183
天津	750	488	65.07	446	15121	7550
河北	750	543	72.40	501	6908	5365
山西	710	496	69.86	455	4703	4343
内蒙古(汉族)	750	508	67.73	469	5369	4771
少数民族				459		2003
辽宁	750	515	68.67	453	10002	4899
吉林	710	490	69.01	432	6281	4180
黑龙江	750	515	68.67	465	7640	4595
上海	750	498	66.40	467	27435	10932
江苏	710	505	71.13	467	10672	6538
浙江	710	491	69.15	474	11989	8428
安徽	750	534	71.20	482	4663	5065
福建	900	618	68.67	550	10706	6860
江西	750	532	70.93	490	4640	4721
山东	900	631	70.11	569	8626	5809
河南	900	629	69.89	569	4875	4532
湖北	750	559	74.53	506	6497	5214
湖南	750	535	71.33	498	5093	5315
广东	900	630	70.00	555	11643	9126
广西	900	648	72.00	573	4144	5620
海南	900	588	65.33	522	6184	5338
四川	750	530	70.67	473	4812	5896
重庆	750	529	70.53	478	4341	5178
贵州	750	474	63.20	390	2458	4934
云南	750	435	58.00	370	4427	6179
西藏(汉族)	750			320		6909
少数民族				210		1309
陕西	900	594	66.00	530	4112	4554
甘肃	750	506	67.47	474	3665	4475
青海(汉族)	750	420	56.00	372	4674	4703
少数民族						1467
宁夏	750		43.07			
新疆(汉族)	750	478	63.70	422	4447	4173
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					6587	5320
少数民族(普通话)					290	1473
少数民族(普通话)	300		40.00	300		

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0

如果我们不考虑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省份(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以及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像贵州和陕西),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一根水平的尺子,而是向较发达(而不是较落后)的地区倾斜。尽管上海的人均GDP是湖北的4倍还多,2000年上海(全国试卷)的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低于湖北62分。同样,北京的人均GDP是贵州的7倍多(1998),大学录取分数线却还低于这个中国最穷的省份。

省内一般本科分数线的倾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一节只简单分析了重点本科分数线在省际间的不同,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在各个省份的变化也呈相似的趋势。同样,在一个省份内(除了三大直辖市),高考录取分数线(特别是本科以下层次)在不同地区也很可能不一样。本节以山东和宁夏为例,说明一般本科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在更小一级地域单元上不同地区的变化。

过去几年中,山东是唯一一个一般本科分数线下放到每个地级市的省份。表3和图1(a)和(b)显示,在低一级的地域或行政单元录取分数线失衡的趋势更加明显。总的来说,在经济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市录取分数线最低(烟台除外),而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市录取分数线反而很高。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他年份的数据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更有甚者,即使在一个地级市内部,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有城乡之差别。比如青岛市,过去几年一直存在两个本科分数线。在1995,1996,1998和1999年,市区理工科考生的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分别是516,563,586和577分,而郊区县及农村分别是534,589,610和583分。也就是说,在青岛市,每年农村考生要比市区考生多出18甚至20多分才有能进入同样的学校。表3还表明,除了在地域(行政)区域变化之外,录取分数线对于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家庭的考生来说也有所不同。家庭在三个工业部门(煤炭,油田和石化)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远低于其他考生。也就是说,在山东省,不但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有不同的考入大学的机会,甚至家庭在某些工业部门的考生也会占尽先机。

表 3 山东省各地市本科录取分数线(2000)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1999)

地、市	本科分数线	人均 GDP(元)	人口(万)	非农业人口比重(%)
济南	539	15806	557.6	40.85
青岛	554	14123	703.0	36.93
淄博	548	14000	405.7	42.54
枣庄	568	6384	355.8	32.32
东营	533	19393	170.6	41.85
烟台	602	12417	644.6	30.35
潍坊	577	7706	840.0	24.49
济宁	583	6739	784.6	22.58
泰安	582	6615	538.6	28.63
威海	586	20341	246.2	33.79
日照	580	6742	275.3	24.01
莱芜	586	8090	122.5	31.67
临沂	574	5045	994.3	17.33
德州	570	5873	531.2	19.18
滨州	569	6629	359.2	20.85
聊城	592	4579	553.9	15.54
菏泽	589	2266	838.3	14.17
石化	554			
煤炭	550			
油田	528			

资料来源：山东招生网 (<http://www.sdzs.gov.cn>)；山东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 2000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科分数线在不同的地区也有所不同，但不像山东省有如此多的分数线。但如表 4 显示，与山东不同，宁夏录取分数线的分布表明贫困地区的考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在这方面，宁夏也许算个特例，与全国和山东省的情况都不同。不同的民族背景的考生有不同的录取分数线。总的来说少数民族考生得到了一些照顾。但作为区域内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回族考生的分数线比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更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和其他民族相比回族是一个弱势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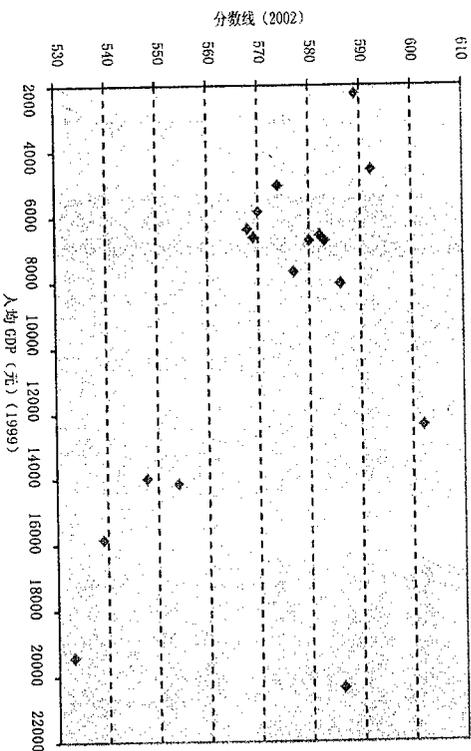


图 1(a) 山东省各地市人均 GDP (1999) 和本科录取分数线(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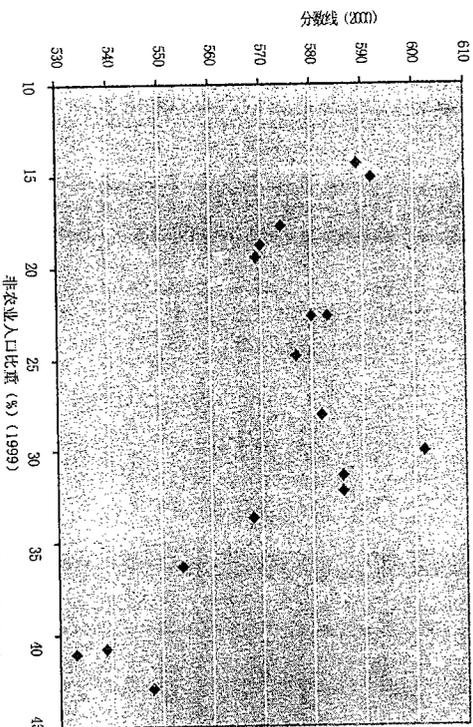


图 1(b) 山东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1999)和本科录取分数线(2000)

概括来讲，通过以上对本科（一般和重点）分数线在多个层次的地域单元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录取分数线不但呈现区域上的差异，而且不同民族背景甚至不同经济/职业部门家庭背景的考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会遇到不同高度的“门槛”。

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

在本节中我们根据已有的信息和对中国计划与发展一系列制度的了解,尝试解释为什么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空间不平衡性会随高考制度存在。

大学招生名额和录取机制

在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几乎完全依据考试分数,高考中的分数线实际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关系^①。地区之间不同录取分数线存在是由于供给的空间分割和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造成的。在几个有关的因素中,关于高考考生的详细信息很少。虽然有每个省考生人数的统计,但它看来不是决定性的因子。我们认为传统招生计划(即招生名额在各地区的分配)的实施造成了各地录取分数线不同。因而,了解每年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制定的十分重要。可惜的是,政府部门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招生计划如何制定的详细信息。本小节我们先介绍大学录取招生计划制度的背景,然后来看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的“官方”解释,最后是6所重点大学录取情况的实例。

表4 宁夏本科录取分数线

地区	院校	1999		2000	
		汉族 (回族除外)	少数民族	汉族 (回族除外)	少数民族
9个贫困县	重点本科	472	462	461	451
	一般本科	417	407	415	405
其他地区	重点本科	482	472	471	461
	一般本科	427	417	425	415

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 Pepper(1984)。

中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已进行了很多改革。作为高校学生的选拔过程,高考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如考试科目,考题形式和改良方法;招生类型,等等。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种选拔制度的核心——招生计划的制定——仍未改变。作为一种计划形式,招生名额的分配一直贯穿于高考的实施过程中^①。招生名额的确定主要有三个方面共同来确定,包括中央政府(主要指主管教育部门)、地方政府和高校。在最高层,中央政府(教育部)决定每年总的招生人数和在各省份的分配。而在底层,根据以往年份的录取情况、学校总的招生名额以及各系的录取计划,各高校决定性的招生在各个系的分配。高校的招生计划需要得到省级招生部门的批准并上报到教育部。

在总的招生计划制定过程中,高校正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并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为了了解高校在初步确定总招生在各地区的分配时采用的标准,我们写信询问6个重点大学(见表4)以及教育部的负责招生的官员。我们只收到两所大学的回应。据这两所大学介绍,制定地区招生名额分配时主要考虑四个因素:各省人口及考生人数,教育质量,学生能力,和国家对某些地区(如西部地区)的照顾政策。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后三个因素,这里仅看第一个因素。通过表4我们大学在各省的招生名额与报考人数只有极微弱的相关关系。总的格局是高校集中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得到远高于其它省份的招生名额。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去探究高校制定招生计划时的考虑和招生名额分配不均背后的真正原因。

中央的政策和体制因素

在中国,国家对高等教育有相当大的控制。除了确定每年的全国招

^① 有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招生名额分配,参见 Joseph C. Kun, "Higher Education: Some Problems of Selection and Enrol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 (1961), pp. 135—148; 1997 恢复高考后,高校逐渐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招生计划的制定,在决定招生名额在各地区的分配时也逐渐有了更大的自主权(Pepper, 1984, p123)。

生和批准招生名额的分配外,中央政府在其他方面通过一些体制性或管理性的政策对高考施加重要影响。下面几段里我们举例说明中央的政策和体制因素对高考的影响。

表 5 2000 年部分重点大学在各省份招生情况及各省参加考试人数

省份	北大	%	清华	%	上海交大	%	同济	%	南开	%	天津大学 (1998)	%	考生人数估计*	%	应届高中生	%
总计	2498	100	1902	100	3059	100	4858	100	2191	100	1807	100	3823161	100	3015069	100
北京	513	20.5	340	17.9	43	1.5	60	1.2	65	3.0	65	3.6	707230	1.4	47569	1.6
天津	71	2.8	48	2.5	49	1.3	62	1.3	640	29.2	652	36.1	80238	1.0	33584	1.1
河北	89	3.6	58	3.0	35	1.1	93	1.9	145	6.6	210	11.6	3059	5.9	181626	6.0
山西	71	2.8	49	2.6	21	0.7	93	1.9	80	3.7	75	4.2	21792	0.6	78622	2.6
内蒙古	47	1.9	46	2.4	22	0.7	0	0.0	60	2.7	60	3.3	25429	0.7	67474	2.2
辽宁	97	3.9	70	3.7	39	1.9	125	2.6	120	5.5	158	8.7	69510	3.5	118892	3.9
吉林	82	3.3	57	3.0	30	1.0	100	2.1	80	3.7	90	5.0	41514	2.9	91419	3.0
黑龙江	84	3.4	56	2.9	39	1.3	103	2.1	80	3.7	90	5.0	41514	2.9	91419	3.0
上海	50	2.0	61	3.2	1685	54.4	1891	38.9	10	0.5	4	0.2	82952	2.1	229852	7.6
江苏	118	4.7	105	5.5	202	6.5	483	9.9	85	3.9	80	4.4	227085	6.4	139549	4.6
浙江	118	4.7	82	4.3	128	3.5	189	3.9	85	3.9	61	3.4	191131	4.4	139549	4.6
安徽	75	3.0	56	2.9	62	2.0	131	2.7	68	3.1	60	3.3	354875	4.7	131453	4.4
福建	77	3.1	100	5.3	60	1.9	123	2.5	57	2.6	58	3.2	265363	2.5	78423	2.6
江西	82	3.3	53	2.8	48	1.5	182	3.7	65	3.0	60	3.3	185335	2.6	91925	3.0
山东	99	4.0	70	3.7	90	2.9	168	3.5	80	3.7	171	9.5	185492	9.4	276377	9.2
河南	94	3.8	60	3.2	52	2.0	124	2.6	60	4.1	93	5.1	102651	6.3	174719	5.8
湖北	104	4.2	95	5.0	104	3.4	171	3.5	85	3.9	85	4.7	161651	4.9	165813	5.5
湖南	96	3.8	73	3.8	57	1.8	111	2.3	85	3.9	71	3.9	114858	4.6	145567	4.8
广东	65	2.6	58	3.0	50	1.9	92	1.9	24	1.1	17	0.9	85999	4.8	182254	6.0
广西	45	1.8	47	2.5	31	1.0	62	1.3	25	1.1	30	1.7	133074	0.5	14010	0.5
海南	25	1.0	16	0.8	15	0.5	18	0.4	0	0.0	12	0.7	89081	0.5	81936	2.7
四川	97	3.9	30	1.5	67	2.2	102	2.1	0	0.0	70	3.9	114868	4.3	143038	4.7
重庆	60	2.4	68	3.5	26	0.8	39	0.8	30	1.4	25	1.4	251342	1.7	51793	1.7
贵州	28	1.1	31	1.5	23	0.7	45	0.9	20	0.9	12	0.7	162982	1.7	45846	1.5
云南	40	1.6	31	1.5	25	0.8	50	1.0	12	0.5	13	0.7	102247	2.0	56504	1.9
西藏	11	0.4	3	0.2	0	0.0	0	0.0	0	0.0	2	0.1	130159	0.2	2458	0.1
陕西	65	2.6	52	2.7	28	0.9	94	1.9	25	1.1	60	3.3	187145	3.9	98128	3.3
甘肃	33	1.3	31	1.6	17	0.5	49	1.0	30	1.4	20	1.1	17905	0.6	56479	1.9
青海	16	0.6	18	0.8	8	0.3	15	0.3	10	0.5	10	0.6	58970	0.6	14156	0.5
宁夏	17	0.7	16	0.8	14	0.5	23	0.5	10	0.5	16	0.9	14120	0.6	17746	0.6
新疆	29	1.2	24	1.3	13	0.5	60	1.2	25	1.1	25	1.4	90079	0.6	54985	1.8

*说明:全国考生总人数和一些省份(有百分比的省份)考生人数来自各主要媒体的报道,其他省份人数是根据往年人数所得的估计,因此各省之和与全国的数字稍有出入,但差别不大。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0/06/07;中国高校网(<http://www.China-school.net>);中国教育网(<http://www.teacher.edu.cn>);中国教育网(<http://www.edu.cn>);中国统计年鉴2001。

(事实上的)向城市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城市等级体系多少是一致的。建国以来,中国采取了城市优先的工业化战略^①。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来代表行政单元的等级体系的话(少数大城市在顶端,极大量的小城镇和村庄在底部),另外一个倒置的三角可以用来表示国家公有资源的分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从中央政府获取最多的公有资源)。城市一直被放在发展和建设的优先位置。通过户籍和其他机制,人员从农村到城市,或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流动得到控制。这种发展战略,加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布的极度不平衡,使得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1%,却集中了1/3多的重点高校(见表5)。同样,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大部分省份的省属高校超2/3集中在包括省会的前三个大城市。如将在后面指出的,这种高校分布的极端不平衡是造成目前招生的计划体制下分数线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以放权为重要特征的改革和变化了的中央—地方(省)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的运作有所影响。从90年代开始,政府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从多渠道自筹资金,包括从地方政府,商业贷款,企业单位和私人赞助等。在资助在自己行政区域内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高校方面,地方政府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参与共建全国性大学。譬如北京市政府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支持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②。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共建计划的一部分,其他名牌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也开始接受来自所在地方政府的

① Kam Wing Chan (陈金永) (1994),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②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北京投资论坛 (<http://www.bjinvest.gov.cn/gb/process/ck01-5.htm>).

表 6 中国高等学校分布(不包括专科学校)

省份	全国性 大学(1)	省属 高校(2)	(1)和(2)占全国 的比例(%) (3)	1999年人 口(万)	人口占全国的 比重(%) (4)	(3)/(4)
北京	32	22	8.9	1257	1.0	8.9
天津	3	15	3.0	959	0.8	3.8
河北	2	20	3.6	6614	5.3	0.7
山西	0	13	2.1	3204	2.6	0.8
内蒙古	0	10	1.6	2362	1.9	0.8
辽宁	3	33	5.9	4171	3.3	1.8
吉林	1	19	3.3	2658	2.1	1.6
黑龙江	3	18	3.4	3792	3.0	1.1
上海	9	14	3.8	1474	1.2	3.2
江苏	9	32	6.7	7213	5.8	1.2
浙江	1	19	3.3	4475	3.6	0.9
安徽	2	18	3.3	6237	5.0	0.7
福建	2	10	2.0	3316	2.7	0.7
江西	0	17	2.8	4231	3.4	0.8
山东	2	30	5.3	8883	7.1	0.7
河南	0	21	3.4	9387	7.5	0.5
湖北	7	23	4.9	5938	4.8	1.0
湖南	2	16	3.0	6532	5.2	0.6
广东	3	28	5.1	7270	5.8	0.9
广西	0	13	2.1	4713	3.8	0.6
海南	0	4	0.7	762	0.6	1.2
四川	2	14	2.6	3075	2.5	1.0
重庆	7	17	3.9	8550	6.9	0.6
贵州	0	10	1.6	3710	3.0	0.5
云南	0	14	2.3	4192	3.4	0.7
西藏	0	3	0.5	256	0.2	2.5
陕西	7	22	4.8	3618	2.9	1.7
甘肃	1	11	2.0	2543	2.0	1.0
宁夏	0	7	1.1	510	0.4	2.8
青海	1	6	1.1	543	0.4	2.8
新疆	0	11	1.8	1774	1.4	1.3
Total	99	510		124810		

注:这里“全国性大学”指直接属于中央政府的大学(教育部或其他部委建设)。它们当中大多数是入选“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目前只有少数几个省属大学进入了“211”工程而成为重点大学。这里“全国性大学”和“重点大学”稍有不同。

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 中国统计年鉴 1999。

投资^①。财政放权鼓励地方的积极参与,这毫无疑问提高了地方(所在省或/和所在城市)在决策(如招生录取)中的发言权。这给予地方政府以更多的理由来攫取稀缺的全国性大学教育资源,尽管理论上这些资源应平等地对全国所有地区开放。同样,在一个省范围内,大城市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能力来参与建设所在地的省属高等院校。

高等学校的“地方化”趋势,加上分布的极端不平衡,凸显了高考中“地主效益”(host benefits)的日益增加的影响。全国性大学集中的省份远少于其他人口大省。从表 4 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地主偏向”。一所大学的回信中提到的一个很“简单”的因素或理由就是,“这所大学坐落在 X 市,因为它在该市的招生名额远多于其他省份”,也确认了这种“地主偏向”(host bias)。同样在一个省范围内,因为大学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优势来竞争大学招生名额。前面对山东的分析提供了佐证。

除了以上分析的导致高校招生地区间不平衡的因素以外,其他基本的体制和政策因素还包括高考报名登记政策和户籍制度。高考中录取名额的制定和实施的前提是考生不能跨出自己的行政区划限(特别是到外省)参加考试,尽管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报名登记的实施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存在来实现。每年高考前夕,教育部门要颁布关于高考报名的规定。规定要求考生参加高考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登记报名^②。通过户口规定来限制考生的流动性,这种报名登记政策和户籍制度共同保证了招生名额分配做法的实施和整个高考制度的运行。可以说,目前的高考和分割的高校录取建立在一种考生“计划性的不流动”

^① 杨东平,“教育成为热门话题”,中国教育网(<http://www.edu.cn>); 中国青年报,2001/02/17。

^② 例如,关于 2001 年高考报名,参见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有关规定(<http://www.jyb.com.cn,2001/04/04>)。除了毕业证、照片,报名费以外,还要求报名者出示户口证明(像户口本)以证明他们是在“应该”在的地方参加高考。

基础之上。户籍制度是目前高考得以实施和运行的制度保障。将来户籍制度如果废除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使得当前这种高考运行的制度保障不存在,势必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高等学校(基于招生名额的地区分配和考生的“计划性的不流动”)招生的方法。当然,这种通过户籍来限制流动性的做法在现实中也遇到了挑战。由于各省录取分数线相差悬殊,分数线高的省份(往往是东部和中部的省份)考生会想方设法到分数线低的省份去参加高考。他们无法进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分数线极低的大城市,便通过亲戚朋友到边远的分数线稍低的省份参加考试,像东北、内蒙古、西北和海南省等都是“高考候鸟”的目的地。尽管中央和大多数地方政府把这种行为看作“违法”(是否违反法律当然值得讨论,特别是对那些通过“正当”渠道真正改变户口和学籍的人)、“高考候鸟”们也要冒很大的风险^①,过去10多年中他们的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并没有呈现减弱的势头。这种现象也给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提出值得思考的课题。因为高考移民应该算作具有“中国特色”一种人口迁移形式。他们也应算作教育移民的一种。然而,与世界其它地方和中国其他方面的教育移民不同,高考移民是试图通过在迁移目的地获得他们也许本应该在迁出地取得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想在目的地取得更高质量的教育。他们只是把迁移目的地作为一个跳板,从来没有打算在那里长期停留。高考移民的存在正是反映了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并总某种程度上讲,反映了高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革的迫切性。

高校的考虑

如前所述,各高校都声称有一套制定区域招生名额的标准。我们在前面讨论了第一个因素,发现招生名额与地区人口只存在非常微弱的

相关关系。在本小节我们讨论高校决策时的其他考虑。

在我们的调查中高校提到的“学生素质”对其定义其实困难。用这个模糊的指标反映了高校在录取过程中除了考试分数外还有它们自己的关于“好学生”的标准。比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老师认为大城市(如北京)的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农村的考生高,尽管农村学生也许能在高考中比城市考生更好的成绩。他们所说的“综合能力”包括“英语口语,计算机,社会力量等”^②。现实中也有许多市民持此观点,甚至包括国家级的教育研究机构的学者也认为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与外地的巨大差异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北京学生的总体素质比外地高”,外地考生高出100分也许是试卷标准不同、(外地)考场管理不严谨造成的^③。当然,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如果(其实很可能)有些高校持有这种观点,势必会影响招生计划的制定和录取时的决定。包括教育部门的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中国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人们都集中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如果很多人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他们同样会有意无意地在高校内外对高校招生和录取施加影响。

就业机制的变化(从计划分配工作到自己面向就业市场)也对高校的招生带来一些影响。在90年代以前,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接受人事部门分配的工作。工作分配按照所学专业、学校的影响力和来源地。在90年代,工作分配的政策渐渐被取消。在90年代初期,就有很多大学,特别是全国性重点大学,开始鼓励毕业生自己找工作。1992年,40%—50%的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通过“双向选择”自己找到工作^④。然而,目

① 中青在线 (<http://www.cyol.net/gb/special/2001-03/09/content-8079.htm>; <http://www.cyol.com/gb/special/2001-03/09/content-8085.htm>)

② 藏铁军:《100分的差距是不是100分的含金量?》(中青在线, (<http://www.cyol.net/gb/special/2001-03/09/content-8081.htm>)

③ 诸平,“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校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http://www.moe.edu.cn/moe-direct/fazhanyizx/167.htm>)

① 每年都有报道有考生在“异地”参加高考被查出取消考试资格,甚至考试结束被录取后取消入学资格。比如最近的一次高考中(2002年)关于海南省取消25名持假学籍、假户口的高考考生考试资格(新华网 2002/07/06)

前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严重分割的。由于大多数城市用人单位仍然要求求职者有本地户口,许多农村或小城市来的学生发现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工作非常困难。就业体制的这种改革,加上户籍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都影响着高校的招生决策。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大城市里(如北京、上海)全国性大学的毕业生,都愿意在这些城市里或经济发达地区(如东南沿海)工作。然而宏观上来讲,他们找到理想工作的机会往往取决于这些城市得到的用来招收外地户口劳动力的户口配额。这种情况多少影响着高校的招生计划。如果一所重点大学在当地城市或发达地区招收较多的学生,学生毕业后会很容易在本市或他们来的发达地区找到工作。相反,如果学校招收太多从贫困农村来的学生,几年后这些学生毕业很多人不愿回家乡工作,但受限于户口在本市或其他地方找工作会有一些困难。这就会降低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而在市场化的时代,毕业生就业率正逐渐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教育质量和声望的重要指标。因此,为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会乐意从所在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招收较多的新生^①。这种靠继续运作的户籍制在维系地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心城市就业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招生的地区性的不平衡。

其它因素也有可能成为高校招生时的考虑。在放权和市场化的改革时代,高校希望建立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网。在达到一定的分数时,录取一些有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只会给学校带来益处。当然,这样的学生只能来自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另外,财政改革和高等学校的“地方化”使得高校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目前还只占一小部分,在市场化时代高校需要自己寻找更多的资源也(所在)地方财政在高等教育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当然,高校也许不会有意地把这些因素纳入招生政策来确保某些考生被优先录取,但在录取过程中处理录取个案时,在考试成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某些人和某些地方的较强的谈判能力往往会发挥作用,高校也许会很

自然地有所偏向。

表 7 省级单位按照考分和比值的分组(2000)

省份	占6所大学总录取的比重 (%) (1)	高中毕业生 (%) (2)	考生人数 (%) (3)	占满分的比重 (%)	比值 1=(1)/(2)	比值 2=(1)/(3)	分组
贵州	0.9	1.5	1.7	63	0.6	0.6	A
云南	1.0	1.9	2.0	58	0.5	0.5	A
西藏	0.1	0.1	0.1		1.2	1.1	A
青海	0.4	0.5	0.6	56	0.9	0.7	A
宁夏	0.6	0.6	0.7	62	1.0	0.8	A
新疆	1.0	1.8	1.7	64	0.6	0.6	A
北京	6.4	1.6	1.8	63	4.1	3.6	B
天津	8.9	1.1	1.1	65	8.0	7.8	B
上海	21.8	2.4	2.8	66	9.0	7.9	B
河北	3.7	6.0	5.4	72	0.6	0.7	C
安徽	2.7	4.4	4.7	71	0.6	0.6	C
山东	4.0	5.8	9.0	70	0.4	0.4	C
河南	3.1	5.2	7.4	70	0.5	0.4	C
湖北	3.8	5.5	5.0	75	0.7	0.8	C
湖南	2.9	4.8	4.9	71	0.6	0.6	C
广西	1.4	2.7	2.5	72	0.5	0.6	C
四川	2.2	4.7	4.3	71	0.5	0.5	C
山西	2.3	2.6	3.0	70	0.9	0.8	D
内蒙古	1.4	2.2	2.7	68	0.6	0.5	D
辽宁	3.7	3.9	3.6	69	0.9	1.0	D
吉林	2.6	2.3	2.2	69	1.1	1.2	D
黑龙江	2.7	3	2.9	69	0.9	0.9	D
江苏	6.3	7.6	6.4	71	0.8	1.0	D
浙江	3.8	4.6	3.9	69	0.8	1.0	D
福建	2.8	2.6	2.8	69	1.1	1.0	D
江西	2.9	3.0	3.2	71	0.9	0.9	D
广东	1.9	6.0	5.3	70	0.3	0.4	D
海南	0.5	0.5	0.5	65	1.1	1.1	D
陕西	1.5	1.7	1.6	71	0.8	0.9	D
甘肃	1.9	3.3	3.8	66	0.6	0.5	D
宁夏	1.1	1.9	2.5	67	0.6	0.4	D
总计	100	100	100.0		1.0	0.8	
A	4.1	6.4	6.8	60.5	0.8	0.7	
B	37.1	5.1	5.7	65.0	7.0	6.4	
C	23.7	43.1	43.2	71.5	0.6	0.6	
D	35.2	45.4	44.2	68.8	0.8	0.8	

资料来源:根据表5计算而得。

①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北大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访谈也证实了这种看法(<http://www.cyol.com/gb/special/2001-03/09/content-8079.htm>)

区域发展机制和空间偏向

如前所述,城市优先的发展政策和随改革正在改变的中央—地方关系加强了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的“地主偏向”。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家的发展政策对高考的影响以及空间表现,在表4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表6。根据相对分数线(录取分数占满分的比重)和两个比值(各省占6校总招生人数的比重分别与各省高中毕业生占全国的比重和高考报考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之比),全部的省份可以分为四组,分别表示在图2中^①。从表6和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变化格局与我们前面对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所作的分析是一致的,并与中国的长期执行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关联。如前所述,由于高等院校的高度集中,中国的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在为考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尽管高中毕业生只占全国的5.1%,高考考生也只占全国的5.7%,三市占了中国6所顶尖大学招生名额的37%,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提到的“地主偏向”。从70年代末经济改革以来,沿海省份一直占据区域开发的优先位置。由于有中央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和(或)巨额投资,沿海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经历了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②。这些地区的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可能影响高等教育招生。一方面,这些“富裕”省份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的高等教育,提高本地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它们有日益增强的经济能力或影响力与中央政府进行各方面的讨价还价,包括对

高考招生名额的争取。沿海省份,除了经济发展在沿海地区处于中等水平甚至稍偏下的山东与河北外,其他都在D组。D组还包括几个内陆省份。本组中的广东省,6所高校的招生与高中毕业生和高考报考人数的比值很低,这看起来是一个特例。这不一定表明广东的考生很难考进这6所重点大学,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广东的考生很多不愿意报考省外的学校,因而这几所高校在广东分配招生名额较少。除极少数地区如北京和上海(特别是上海),广东的情况在其他省份并不多见。

A组包括了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省份。国家的招生政策给予这些地区的高考考生(特别是少数民族考生)一些优惠照顾,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期“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以后增加了高校对西部的招生。本组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其他许多省份。然而单从6所重点高校的招生来看,本组各省的考生总的来说进入这些名牌大学的机会要大大低于D组的省份,更不用说B组的三个直辖市了。这多少表明中国还有许多要做来提高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获得机会。和其他省份相比,中部的省份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中往往处于劣势;这些省份既没有较强的经济力量和影响来与中央讨价还价,又不是最穷的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能得到中央的同情和补贴支持。由于人口基数大而境内高校数量少,这些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最高,竞争最激烈。在我们的分析中,这样的6个中部省份归在C组。山东和河北两个人口大省也分在了这一组。2000年,C组的高中生和高中毕业生和高考报考人数分别占到全国的43%和44.2%,然而6所重点大学在这些省份招生还不到1/4。

^① 具体地说,分组的依据是:A组——相对分数线低于65%,两个比值都小于1.5,包括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和贵州;B组(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录取分数线很低(低于67%),两个比值很高(分别大于4和3.5);C组——相对分数线最高(大于70%),两个比值最低(都小于0.8),包括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和广西;D组——其它省份,相对分数线和两个比值介于A组和D组之间。

^② Max Lu and Enru Wang (2002),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Chang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Post-reform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Vol. 33 No. 1.

总的来说,虽然我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择的这6所大学作为样本不一定完全代表全国所有高校招生的总体格局,但表6和图2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校招生中的“地域倾斜”以及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地区差异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某种关系。在省内,我们同样能够发现高考录取的空间变化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如前面提到的山东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全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山东省也存在典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比西部的地市往往能得到更多的优惠发展政策和建设投资。同样,在发展的蓝图上往往事实是城市比农村优先,

工业(像煤炭,油田和石化)比农业优先。如表3和图1所示,东部的富裕的、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市高考分数线远低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相对于考生的比例,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比农村和不发达地区能得到更多的招生录取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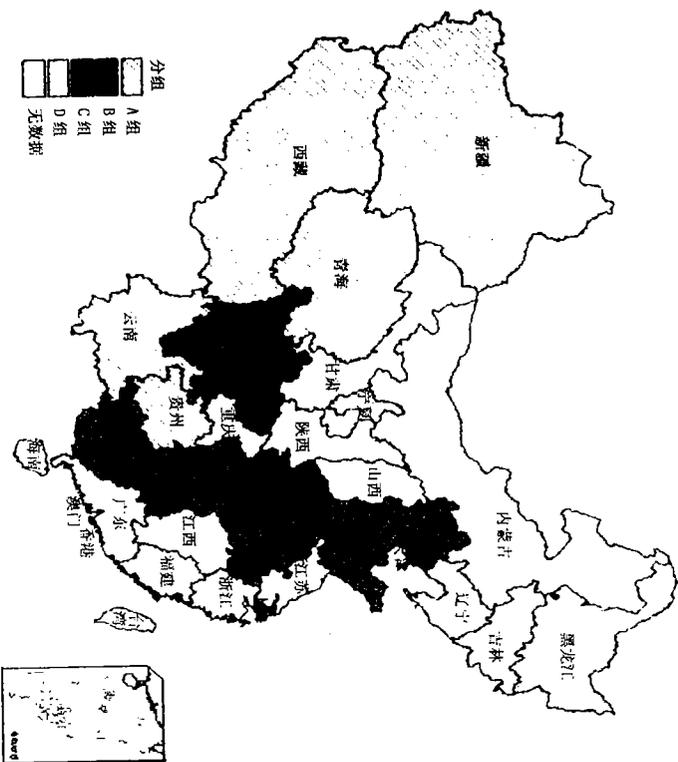


图2 各省份按照高考录取机会分组

除了上述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地域性差异以外,改革时期的新型区域发展机制还会造成非地域性的差异。亦即,不同经济或社会属性的人群可能会有不同的机会。在分权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中,地方政府正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来促进区域发展。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措施来实现发展目标。高考,作为获得稀缺高等教育资源的门户,有时也被用作促进区域发展的资源或手段。比如山东,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现在正努力采取措施来加快工业化进程。我们没有足够的准确资料来解释省内不同的分数线是如何确定的。但从家庭来自三个主要工业部门

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一直单列并明显偏低这一事实来看,高考似乎被用作对某些经济部门的“补贴”。很多地方政府把引进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作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一些地方,吸引人才的“诱饵”之一是针对参加高考的“人才”的子女给予一些照顾。海南和黑龙江的做法说明了这种趋势^①。一般来讲,来自这些“人才”家庭的子女自小比其他许多学生,特别是农村的学生,好得多教育条件。这些给予他们的优惠照顾无疑会进一步加大“优势”学生和“弱势”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衡。在某些地方,高考被用来鼓励或“奖励”人们来执行政府的政策。譬如完成国家的计划生育任务,是所有地方政府要贯彻实施的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高考也开始被用作一种资源和措施来宣传甚至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参加高考的独生子女给予照顾^②。有人

前面我们谈到,户籍制度在保障高考的实施和实现“计划性的不流动”至关重要。作为一种对高校录取存在的巨大的地区差异的反应,“非法”的高考移民——“高考候鸟”——已存在了10多年。形成对比的是,有些人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来突破户口的限制帮助他们的子女在原来的户口所在地以外参加高考。他们可以通过在某个高考分数线低的城市投资、购房,或调动工作来取得当地城市的“蓝印户口”甚至正式户口。从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和厦门等,开始采用“蓝印户口”政策来吸引人们来投资

① 在海南,省政府在1999年颁布了一个文件,清楚地列举了8类科技人员,如果他们来海南工作,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海南参加高考不受户口限制并在录取过程中可以得到10分的加分照顾。参见中共海南省委29号文件(1999),“关于吸引优秀科研技术人才的若干规定”(海南日报,2000/04/15 <http://www.hndaily.com.cn>);2000年,黑龙江规定,父母是省级或省级以上的优秀专家或有博士学位的考生,在报考省属院校时可得到20分的加分照顾(哈尔滨日报,2000/05/31)。

② 泉州晚报,2000/05/08。

③ 人民日报,2000/09/22 (<http://www.peopledaily.com.cn/wsrmlt/lt.html>)。

或购买房地产。这些人的子女也可以获得“蓝印户口”，并可以在可以这些往往分数线比较低的城市参加高考。在北京也有类似的政策。除了最近的新政策允许私营企业申请永久北京市户口外^①，北京早就实行了一些政策，利用户口来开发郊区。1997年北京出台小城镇开发办法，允许外地来京投资(50万元以上)或买房(两居室以上)的人可以购买北京市郊区户口^②。这个政策吸引了很多人，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投资的个体工商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买北京户口只是为了子女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得到和北京考生同样的录取待遇^③。每年每个镇大约只有300个户口出售，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特别是那些交通便利的镇像昌平区的小汤山^④。引发争议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经济能力在大城市里购买“蓝印户口”或正式户口。实际上，买户口来异地参加高考只是高考录取不平衡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新型的区域发展机制引发了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一些非地域性的不平衡。但在很多时候，这些非地域性的不平衡与前面论述的地域性的不平衡是密切相关的。新的区域发展机制带给一部分有较高社会地位或经济能力的人一种可能，使他们克服他们原来地域上的劣势为自己的子女争得较好的高考机会。当然，对大多数农村的或(和)低收入家庭的考生来说，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去面对高考中的激烈竞争。

结束语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录取选拔制度，高考自从1977年恢复

以来已连续进行20多年了。全国统一考试，有计划地实行，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容易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选拔制度是遵循平均主义的原则而不存在不平衡和不平等。然而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体现在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有规律的地区差异。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层次上发现了高等教育录取中的“地域偏见”。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或贫困的边远省份以外，基本的趋势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高考的分数线有可能越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处在第一梯队，(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却远低于其他所有的省份。一些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甚至偏下的人口大省，每年高考都经历最激烈的竞争，录取分数线非常高。“地主偏向”在省一级的行政地域单元上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高校集中的直辖市最为突出。

除了三个直辖市外，在几乎每个省级单位内也同样存在高校录取的地域差异。本文以宁夏和山东为例，阐述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在省内各地区的变化。特别是山东，多年来本科录取分数线一直划到地级市，不同的地市录取分数线可能相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山东省内本科录取分数线随的地区变化呈现出和全国类似的特点，甚至趋势更为明显，即录取机会仍然向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倾斜。青岛的例子显示，即使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城区的考生可能比市属的郊区和农村的考生有更大的机会升入大学。对山东的分析证实了“地主偏向”在地市甚至更小的行政地域层次的存在。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性严重失衡，造成的原因很多。其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一直实行的招生计划地区配额制度所造成的各地区对高等教育的供给(招生名额)和各地区实际需求(体现在报考人数和合格的考试成绩)的不匹配。高考招生计划名额的地区分配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需求，国家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和规划，各高等院校自己的情况，以及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影响和诉求来做出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和信息，也许有很少有兴趣的研究者能真正了解高等教育招生名额分配的详细过程和制定依据。我们综合所掌握的信息，根据对高考的了解，分析了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地区差异的主要可能因素。中央政

① 从2001年10月1日起，北京市颁布规定，允许外地来京投资的私营企业主在投资超过一定的门槛后申请永久北京市户口(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1-10-01/369926.html>；北京青年报，2001/10/15)。

② 具体规定见北京房地产网(<http://www.bjhouse.com.cn/longmai/win1.htm>)。

③ 北京青年报：《高考带动京郊房地产热》，2001/05/18 (http://www.bjyouth.com.cn/Bqb/20010518/GB/4617_D0518B0211.htm)。

④ 如上。

策和国家的一些管理制度体系与目前已高考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录取制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事实上的)向城市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和中国的城市优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三角型的城市等级体系、倒三角的公共资源配置和历史性因素等一起造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极端不平衡是一致的。其次,以放权为重要特征的改革和变化了的中央—地方(省)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的运作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参与建设所在地高等院校的能力的提高和机会的增多,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包括省与所在城市)、省与省内城市的高等学校共建计划,加速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地方化”,使得“地主偏向”更趋明显。第三,以招生计划地区配额制度为核心的高考是建立在考生“计划性的不流动”的前提之上的,当前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和运作是保证目前这种高考制度实施运行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尽管有高考登记制度和户籍的限制,高考分数线的巨大地域性差异还是在客观上“鼓励”着越来越多的“高考移民”。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引发人们对它的合法性,社会成因和影响,以及迁移过程和模式的思考和探讨。

我们分析,招生计划的制定和高考录取过程中,高等学校也有自己的考虑。比如,除分数作为主要的依据外,高校可能会有自己的关于“高素质”学生的标准。在具有相同或相差无几的考试分数时,不同“素质”的考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录取机会。90年代以来就业机制的变化以及户口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对高校招生来源也会产生影响。市场化时代高校越来越注重包括毕业生就业率在內的一些量化指标的提高,可能使得它们在保证一定高度的录取分数线前提下不得不考虑学生来源地的地区因素。还有,在放权化和市场化时代,高校需要建立维护自己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并重视所在地方的影响,维持和所在地的良好互动关系。这些考虑也可能会影响招生过程和结果。

基于所掌握到的资料,通过对6所重点大学录取情况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区域发展机制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空间不平衡有某种程度的关联。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使得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的梯度布局。这种布局与高考录取机会的空间格局在某些方面有一致性。我们再次发现:北京、上海和天津从这几所重点大学得到的

招生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虽然它们名义都是全国性重点大学。总的来说,经济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中部人口大省,仍然录取名额最少(相对于人口和考生数),考生进入这些大学的机会最少。虽然国家一直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及极贫困地区在高考录取方面一直有些照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加强了力度,这些地区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很低,但总的来说重点大学(至少讨论中的6所重点大学)在这里的招生仍然不多,说明这些地区的教育基础较为落后。虽然说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并一定存在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本文中事实也决不是偶然的。在更低一级的地域单元上,区域发展的新型机制开始导致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一些新的不平衡。除了国家(中央)制定的统一的照顾政策外,地方(主要是省一级)也纷纷开始制定一些政策,照顾来自某些特定群体的考生,已从某些方面促进自己地区的区域发展和确保某些政策目标的实现。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某些照顾政策已违背了“照顾”的原则,因为有些政策有时只会照顾到本已处于优势的群体。这些照顾政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差异往往体现在不同属性的人群中,而不是不同的地区之间。但这种差异与前面论述的地域性的差异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在目前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下,录取分数线的地域性差异实际上是历史因素和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在空间上的综合反映;非地域性的差异也与地域性密切相关。综合各种“地域性”和非地域性的因素,我们可以粗略地判断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中,在具有相同或接近的考试分数时,哪些考生处于劣势,哪些处于优势。比如说,人口大省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非民族自治地区的贫困农村的汉族考生在高考中最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弱勢群体”。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平衡,目前还似乎没有更好的有根本区别的高等教育录取制度来代替现行的高考。因为完全废除招生名额按地区分配的做法似乎也不行。因为那样因为会使基础教育薄弱的地区(如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失去高等教育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和高考的改革,高校和地方正获得越来越大的自主权(譬如有些地方如上海、北京和广东自行命题,和有些重点高校在一定

范围内自主招生),公共高教资源的地方化趋势也日趋明显。我们有理由担心,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地区性失衡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虽然仍是全国统一考试,在放权化的时期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各种优惠照顾政策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标,正在某种程度上从另一方面改变着这种统一性。我们不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但我们关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空间差异所扭曲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我们认为国家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应该采取措施,避免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马太效应”。因为日趋严重的不平衡实际上会不利于国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种种不平衡的存在也危害我们对公平价值观的追求和实现,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高等教育的改革,特别是对招生制度的改革,在注重平衡性和公平性的同时,必须和解决基础教育发展的严重地区性不平衡挂钩。而各地区基础教育的平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因此,建立一个新的高效的高等教育体系,保障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需要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中来逐步实现。

(作者单位:[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

赖德胜

摘要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我国全部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但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却有越来越难的趋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使大学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但城里的用人单位却因过高的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而不能吸收更多的大学生。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缓解和解决,要依赖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体制改革。

一、引言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能给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带来较高的回报。但教育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是以受教育者能找到合宜就业单位为前提的,否则,投资教育就不一定是件合算之事,最近几年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更难了。现在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官方公布的两组数字我们仍可见大学生就业难的程度一斑。一是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1999年和2000年本专科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分别为82%和86%,也就是说,截止到派遣工作结束,仍有18%和14%的大学毕业生尚未落实就业单位。二是报考研究生人数连年大幅度增加,2000年共有39.2万人报名参考,其中应届本科毕业生16.6万人,比上年增长24%;2001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46万,比2000年增加了18%。考研的动机当然很多,但据调查,社会就业压力增大是众多学子选择考研的首要原因。由于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的几年内我国将继续扩大大学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将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可以预见,大学毕业生

*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是在哥德堡大学做访问研究期间完成的。感谢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瑞典学会(SI)的资助,感谢 Björn Gustafsson 和郑京海 对论文初稿的有益评论,但文责自负。